

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张力与调适

汤顶华,张佳婧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当算法推荐技术深度嵌入网络空间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在对象识别、内容配置、供给实施与效果反馈的协同下,逐步形成了动态化的供给过程。作为平台组织信息供给的重要技术条件,算法推荐一方面可以提升供给对象识别、供给内容配置和供给过程调适的现实可能,推动网络思政由相对统一的内容投放转向更具差异化和针对性的供给展开;另一方面,算法推荐的运行又并非天然地契合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在对象确认、内容导向和主导能力等方面面临一系列现实张力。具体来看,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与主动推荐逻辑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供给对象确认失准、潜在对象遗漏和对象结构固化;个体偏好强化与普遍性内容供给弱化之间的错位,易挤压普遍性内容的传播空间,也会改变供给内容的价值导向与配置逻辑;而平台权力扩张与教育主导权弱化之间的矛盾,则会进一步削弱精准供给的决策基础和实施主导能力。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张力调适,不能停留于技术修补,需以动态识别精准把握教育对象,以高质量内容强化公共价值供给,以协同治理保障教育主体主导权,从而推动算法推荐更有效地服务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实践展开。

关键词:算法推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精准供给;普遍性内容;教育主导能力

202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是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遵循”^[1]。其中,《条例》“第二板块为第四至第十章,主要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作出规定”^[1],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以下简称网络思政)作为单独章节加以强调,彰显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网络思政工作的紧迫性。当前,网络平台持续迭代发展,促使教育对象的成长模式、需求结构与场景条件不断变化,进而对网络思政供给的针对性、适配性与实效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过程中,算法推荐逐渐成为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重要技术。围绕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分析取向:一方面,从精准供给的概念内涵和实践展开入手,强调“精准供给是精准思政的核心”^[2];另一方面,从算法推荐的技术优势及运行特征入手,讨论其在“精准性识别、针对性供给、交互性体验”^[3]中的具体作用。

尽管现有研究已为理解算法推荐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其一,研究多集中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特定场域,尚不足以解释开放

引用本文:汤顶华,张佳婧.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张力与调适[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2):30-3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项目(23VSS043)

作者简介:汤顶华(1978—),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53008108@qq.com

网络空间中的精准供给问题;其二,不少研究仍将算法推荐附着于“数字思政”^[4]“智能思政”^[5]等宽泛技术框架之下,其独立运行逻辑和作用边界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其三,对算法推荐如何系统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全过程的研究,缺乏较为集中的整体性说明。随着相关讨论的不断深入,已有研究也逐渐意识到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逻辑并不天然同构,二者之间存在“不容回避的内在张力”^[6]。基于此,有必要聚焦算法推荐这一关键数字技术,围绕其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运行过程展开分析,以系统把握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作用逻辑、现实张力及调适路径。

一、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基本内涵与算法推荐的运行逻辑

理解算法推荐赋能下的网络思政精准供给,需要厘清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与算法推荐两个方面的基础问题:一是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何以成为当前网络思政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二是算法推荐何以能够进入并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前者探讨的是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概念边界与现实展开,主要回答“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是什么、为什么被提出”;后者涉及算法推荐的运行流程、技术特征及其作用方式,主要回答“算法推荐如何运行并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基于此,本部分将首先界定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展开,继而分析算法推荐的运行流程及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说明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作用逻辑。

1. 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内涵及现实展开

精准供给是在公共治理语境中逐步形成并被引入网络思政研究的话语表达。进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后,这一概念逐渐与网络思政、精准思政等研究相结合,其关注重点也由一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供需匹配问题,转向网络空间中思政内容如何面向差异化对象实现有效供给的问题。基于既有研究,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可以理解为网络思政在网络空间中的特定供给形态,主要指“在精准识别用户特征和需求的基础上,以需求为导向,为不同对象制订针对性供

给方案”^[7],并在此基础上对思政内容及其供给方式作出有针对性的配置、调整和优化,同时依据供给效果不断修正供给过程,以提升供给的适配性、有效性和引导性。网络思政着重于“教育渠道的网络化”^[8],精准思政强调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高效性、针对性、全时性和智能性”^[9]的整体取向,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则是将这一取向进一步落实到网络空间中的具体思政供给实践。

在理论层面,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主要是在网络思政研究、精准思政研究和数字技术介入研究的交汇中逐步展开的。网络思政研究首先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网络空间之中,关注“作用形态、互动方式及客观效果”^[10]的变化,使供给逐渐成为影响网络思政实效的重要环节。精准思政研究则围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为核心议题展开,相关成果从网络行为画像^[11]、多模态思政供给^[12]、AI智能体赋能^[13]等角度,对对象识别、内容配置和教育干预的精准化问题作出分析,为“精准”维度提供了方法论支撑。随着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学界又从精准化走向智慧化^[14]、网络思政实效提升^[15]和数字化主体间性^[16]等角度对网络思政中的供给环节给予了更多关注。由此,网络思政精准供给逐步被理解为一个围绕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效果展开的具体实践问题。

在现实层面,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展开首先表现为政策制度要求的持续强化。2021年,《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并强调“因地、因人、因事、因时制宜开展工作”^[17],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由此初步获得了总体方向上的政策奠基。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18],将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提升到国家改革机制层面。2025年,《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又明确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增强亲和力、感染力”^[1],从党内法规层面强化了精准原则的规范约束。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也改变了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实践基础,并推动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效果的相关条件发生相应调整。其一,在供给对象方面,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对象基础已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相对稳定结构,转向网络空间中的开放生成结构。“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私营企业主、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工、留守儿童、网民等新兴群体不断涌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不断分层化”^[19],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所面对的,更多是网络空间中具有不确定性和生成性的对象。对象边界并不预先固定,而是在内容接触、互动参与和反馈形成过程中逐步显现,对象生成的不稳定性 and 生成性成为影响供给有效展开的重要条件。这也意味着,网络思政供给必须在对象把握上形成更为细致的工作取向。其二,在供给内容方面,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内容建构与现实需要之间的适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被建构得日益庞大,体量显著增加”^[20],缺乏足够的结构性和系统性考量的供给内容难以有效回应差异化对象的现实需要。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内容建构,应当立足网络空间中的现实条件和对象需要。随着教育对象生成逻辑和网络空间运行条件不断变化,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既有内容体系在现实展开中的进入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显不足。其三,在供给方式方面,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变化实质上体现为供给关系实现形式的变化。供给方式并非附属于内容之后的技术手段,而是关系到内容能否在具体平台和场景中进入对象的重要条件。由于网络空间中平台运行规则和对象接受条件并不一致,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不能沿用单一方式展开,而是需要根据现实条件重新安排内容与对象之间的连接路径,以提高供给的实现程度。其四,在供给效果方面,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日益表现为以效果检验为内在环节的供给过程。传统供给模式往往将效果置于供给完成之后加以评价,更多表现为事后性的检验环节,而在网络空间条件下,供给效果逐渐嵌入供给活动本身,成为后续供给调整的重要依据。内容进入对象视野之后所形成的点击、评论及转发等,将进一步参与到

供给过程的再组织之中。因此,供给效果已不宜仅被理解为供给完成之后的结果性指标,而应被视为供给过程内部的重要校正依据。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也由此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过程性特征。

2. 算法推荐的运行流程及特征

依托用户行为数据、内容特征数据和平台交互数据,算法推荐通过“建立用户画像、标签分类处理和语义推荐,实现海量信息和不同用户间的高效匹配”^[21],形成了“以数据作为前提性基础,以用户需求作为逻辑性起点,以个性化适配为目标性导向”^[22]的信息配置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算法推荐具备一套完整且连贯的运行逻辑:首先是多维度数据采集。平台全程记录用户网络行为轨迹,同时对各类内容进行特征化提炼与标准化处理,为后续模型搭建和内容匹配提供数据支持。其次是用户画像搭建与标签化处理。在长期数据积累的基础上,算法推荐通过画像建模和标签生成,将用户偏好与内容特质转化为可量化、可运算的结构化表达,从而为内容筛选与精准分发提供计算依据。再者是智能内容匹配与排序分发。在用户画像和内容标签形成之后,算法推荐通过建立用户侧特征与内容侧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海量信息进行初步筛选与分类整合;在此基础上,系统再依据平台运营规则和流量机制对候选内容进行权重排序,最终实现个性化推送。最后是动态反馈与迭代优化。算法推荐在内容推送之后继续收集用户后续行为数据,并将其作为检验匹配效果和修正推荐逻辑的重要依据,由此推动推荐策略与运算规则的持续更新,保障推荐系统在反馈循环中保持运行稳定性。

就运行特征而言,算法推荐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以数据积累为运行前提,平台对内容供给的后续判断主要建立在用户行为信息的持续沉淀之上。其二,不以统一分发为基本形态,而是以用户特征区分为依据形成差异化匹配,由此推动内容供给呈现出更强的分层特征。其三,以反馈回流为运行支撑,用户后续行为会不断进入新的计算过程,并据此修正既有推荐结果。其四,以持续优化为运行取向,平台依据用户反馈不断修正内容配置和分发安排,

以提升内容供给的现实触达效果。

总体来看,算法推荐并非单纯附着于平台运行过程中的技术背景,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能够持续组织内容配置和信息触达的信息机制,其运行固然表现为若干相互衔接的技术环节,但更值得注意,这一机制已获得了对内容供给过程的实际塑形能力。算法推荐逐渐嵌入对象识别、内容配置和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进而成为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重要技术条件。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算法推荐何以进入并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

3. 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作用逻辑

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是围绕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效果展开的具体供给实践。作为平台组织信息的重要技术,算法推荐恰恰能在上述环节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重要变量。

首先,算法推荐深刻影响了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供给对象的识别方式。传统供给活动中对供给对象的把握,主要建立在教育主体的经验判断基础之上,其对象确认更多依赖教育主体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观察能力与预判水平。算法推荐介入之后,对象识别则越来越依赖行为数据的持续积累及其结构化处理,具体来看,是平台通过对用户行为痕迹的记录和分析,不断形成关于对象特征的计算性表征,并据此影响供给对象的确认过程。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的对象把握由经验主导的识别方式逐步转向数据参与的识别方式,供给对象在算法识别过程中被不断纳入、重新界定并持续细化。

其次,算法推荐影响了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的供给内容配置逻辑。算法推荐虽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但会通过匹配、筛选和排序等环节对既有内容进行重新组织,从而影响内容供给的实际展开。传统供给活动中,内容配置更多取决于教育主体基于育人目标所作出的主观安排。算法推荐介入之后,内容能否进入供给过程以及以何种条件进入对象视野,日益受算法所建构的关联关系和排序结果影响。质言之,供给内容的进入机会、进入顺序及实际展开范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算法逻辑的持续塑

形,内容供给已不再只是教育主体单方面的配置行为,而是成为在平台规则和算法计算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新的组织方式。

再次,算法推荐影响了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供给方式的实现形式。在算法主导的平台环境中,内容进入对象视野的现实条件越来越受平台规则影响,内容进入的先后次序、现实可见程度及持续停留的可能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算法安排的塑造。因此,供给方式不再只是内容发布之后的技术环节,而逐渐成为网络思政精准供给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对于网络思政供给而言,算法推荐所作用的,正是内容进入对象的现实路径。也就是说,供给活动不仅要考虑“供给什么”,还必须处理好“如何进入”这一问题。

最后,算法推荐影响了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的供给效果检验与调适机制。算法推荐通过对用户反馈的持续接收和分析,使原本主要发生在供给之后的效果判断,逐步嵌入供给运行过程。供给效果因而不只是结果性的评价指标,而开始进入后续供给活动的再组织过程,成为修正内容安排和调整供给实施的重要依据。由此,网络思政精准供给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在反馈中不断展开、在运行中持续校正的过程性实践。

二、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张力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23]算法推荐对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介入,同样体现出这种双重性。技术嵌入并不意味着育人效能的自然生成,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作为一种具体供给实践,主要围绕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效果展开,算法推荐赋能下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现实张力也主要集中在这些环节:在供给对象层面,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与主动推荐逻辑之间形成冲突;在供给内容层面,个体偏好的持续强化容易造成普遍性内容供给的弱化;在供给方式和供给效果层面,平台对数据、规则的控制会进一步影响供给的实现方式与效果评估,进而压缩教育主体的主

导能力。基于此,算法推荐赋能下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现实张力集中表现为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与主动推荐逻辑的冲突、个体偏好强化与普遍性内容供给弱化的错位、平台权力扩张与教育主导能力受限的矛盾。

1. 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与主动推荐逻辑的冲突

与先于供给活动而完整呈现的既定群体不同,网络空间中的教育对象是在信息接触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质言之,网络思政中的教育对象既具有不确定性,也具有生成性。其不确定性表现为对象边界、思想状态和现实需求难以被预先固定;其生成性则表现为潜在对象可能在特定事件、话题卷入和情境触发中转化为现实教育对象。然而,算法推荐所依托的主动推荐逻辑,要求教育对象在供给活动开展之前即被识别,并进一步转化为可供计算的结构化表征。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特征,与主动推荐逻辑所要求的对象可计算化之间存在明显张力,而这种张力进一步作用于供给对象的确认、供给范围的延伸及供给对象结构的动态调整,从而使精准供给在对象确认环节面临更为复杂的实践阻碍。

其一,教育对象生成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供给对象确认的难度。网络思政精准供给要真正成立,首先必须回答“供给面向谁展开”的问题。网络空间中的教育对象本身处于持续变化之中,供给对象的确认无法依赖静态归类。算法推荐所依托的是既有行为数据、历史偏好和标签画像,能够识别的更多是已经留下足够行为痕迹的对象。因此,精准供给对对象的把握易被既有画像所替代,供给对象的确认也更多表现为对过去数据的确认,而不是对现实变化的把握。对于仍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对象而言,其尚未充分显现的思想倾向和现实需求,便难以被及时纳入精准供给的判断范围。

其二,主动推荐的识别方式压缩了供给触达的延伸空间。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同时要面对尚未形成充分显性表达,但在特定情境中可能迅速转化的潜在对象。然而,算法推荐主要依据可见的行为数据展开对象识别,其逻辑更适合同围绕已经活跃表达并形成偏好记录的用户实

施内容推送,那些尚处于潜在状态、未被数据充分标记的对象则较难进入推荐系统所形成的供给链条。网络思政精准供给虽在形式上强调精准,却易在实践中更多地面向“已经被看见的人”持续展开,而对“尚未被看见的人”缺乏足够有效的触达能力,导致精准供给范围应有的延展性在主动推荐逻辑中受到压缩。

其三,既有画像的持续强化固化了供给对象结构。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所要求的对象结构应当保持开放和流动,但在算法推荐作用下,对象一旦被纳入既有画像和标签体系,后续供给往往会沿着已有偏好和既有特征持续展开。通过相似推送和持续匹配,算法推荐不断强化对象与特定内容之间的既有联系,使供给活动更易稳定作用于已被识别出来的互动圈层。在算法推荐作用下,供给对象结构更易趋于收束,供给活动也会更多停留于既有对象范围及其内部关联之中。

2. 个体偏好强化与普遍性内容供给弱化的错位

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既要提高内容与对象之间的适配程度,也要确保普遍性内容在差异化供给中保持必要位置。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通过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观念引导,将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一定阶级和集团共同的、长远的政治目标上来,从而为维护其政治统治和根本的经济利益服务的。”^[24]这表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虽要有效回应差异化对象的现实需求,但其根本指向在于通过供给内容的组织和进入,使具有共同价值引导意义的内容能够持续作用于教育对象。算法推荐的内容配置主要围绕个体偏好展开,并通过持续匹配和推送不断强化这种偏好结构,个体偏好在内容配置中的权重不断上升,具有基础性、理论性和共同性意义的思政内容在供给链条中的进入空间则相应受到挤压,从而形成个体偏好强化与普遍性内容供给弱化的错位。

一方面,偏好固化压缩了普遍性内容的供给展开空间。具有价值引导意义、理论阐释意义和共同体塑造意义的内容原本应当在网络思政供给中占有稳定位置,并需通过持续展开进入差异化对象视野。然而,算法推荐通常依据

用户既有浏览轨迹和互动记录判断其兴趣倾向,并优先组织与此更为接近的内容进入供给链条。“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25]。随着相似内容的反复配置,教育对象所接触的信息结构逐渐向偏好内容集中,普遍性内容更易因为与既有兴趣不完全重合而在供给过程中处于展开不足的状态。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对普遍性内容的覆盖能力受到压缩,供给活动虽在形式上增强了适配程度,却未必能够保证普遍性内容在差异化对象中的充分展开。

另一方面,偏好迎合改变了供给内容的导向配置逻辑。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活动既要考虑内容能否进入对象视野,也要考虑内容能否承担价值塑造和公共认知建构功能。算法推荐更加重视点击、停留、评论和转发等量化反馈,将即时兴趣与互动表现作为内容配置的重要参照。在算法推荐的排序逻辑中,能够迅速引发感官关注和情绪反馈的内容往往更易获得优先进入机会,而那些具有较强理论性、思想性和普遍育人意义的内容则更易在排序分发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导致供给内容的导向结构发生了位移。在偏好逻辑持续作用下,原本由育人目标支撑的内容安排逐渐转向以兴趣匹配和即时反馈为主要依据的排序机制,由此削弱了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价值引导功能。

3. 平台权力扩张与教育主导权弱化的矛盾

算法推荐深度嵌入网络空间之后,平台在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的作用已不再限于技术承载,而逐渐进入供给实现的条件层面。教育主体虽仍承担供给责任,但精准供给的现实展开越来越依赖平台所掌握的数据条件和运行规则。“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26]54} 当前,精准供给在形式上仍由教育主体主导,在实际运行中却不断受到平台条件的制约,平台权力扩张与教育主导权受限之间的张力由此生成,并具体表现为供给决策、供给实施和供给评价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供给决策依据的平台化削弱了教育主体的判断主导。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展开,首先以供给对象及其需求判断为前提,传统条件下,这一判断主要依赖教育主体的经验把握,

而进入平台环境之后,其形成过程越来越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之上。平台对用户行为信息的记录和处理,也逐渐构成供给判断的重要依据。然而,关键数据主要集中于平台一侧,教育主体的数据获取条件相对有限,“大数据的兴起与算法技术的发展使‘数据’‘技术’与‘监控’紧密结合起来”^[27],供给判断虽仍由教育主体作出,但其形成基础已在相当程度上外移至平台,教育主体的判断主导能力也随之受到限制。

其次,供给实施过程的平台化压缩了教育主体的安排主导。精准供给所要处理的,并不止于供给内容的确定,还包括供给活动如何在具体平台条件下获得实现。进入对象视野的现实路径,已不再完全取决于教育主体的主观安排,而越来越建立在平台规则基础之上,平台对内容进入条件的设定,也因此成为影响供给实施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主体虽仍负责供给内容的组织,但对供给活动如何真正落地已难以形成完整掌握。供给实施日益表现为对平台规则的依托,教育主体的主动安排空间则相应收缩。内容能否优先进入对象视野、供给活动如何获得现实展开,也越来越受平台规则影响,教育主体在供给实施中的主导能力随之减弱。

最后,供给评价标准的平台化弱化了教育主体的价值主导。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并不止于供给活动的完成,还包含对供给成效的判断。在平台环境中,这一判断建立在用户反馈基础之上,相关行为指标也经由算法处理逐步进入评价过程,并进一步影响后续供给调整。随着这类指标在供给运行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供给效果的判断标准呈现出向平台逻辑靠拢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主体对供给成效的把握易受平台反馈机制的牵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以育人目标为导向的价值判断。由此,供给评价的形成基础发生了变化,平台反馈体系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教育主体在供给评价中的主导能力也随之受到影响。

三、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张力调适

伴随技术嵌入程度不断加深,网络思政精

准供给中的对象确认、内容进入和主导能力维系都被置于新的技术条件之下,算法推荐在提升供给适配程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象把握失准、普遍性内容供给弱化和主导能力受限等现实张力。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张力的调适,应被理解为对技术逻辑与育人逻辑关系的重新调整。鉴于此,调适相关张力需立足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关键环节,从教育对象把握、普遍性内容进入和主导能力稳固层面进行回应,以此推动算法推荐更有效地服务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实践展开。

1. 以动态识别提升教育对象把握的准确性

明确教育对象是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有序展开的逻辑前提。网络空间中的教育对象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特征,其主体形态的显现过程与信息接触行为、互动反馈机制深度交织,教育对象基础特征的深刻转变使得静态化的对象画像难以有效承担教育对象确认的核心功能。为回应教育对象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与供给主动推荐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需将对象识别环节真正转化为精准把握供给对象的坚实基础。在教育对象持续生成的现实条件下,动态化的对象识别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供给对象确认的精准度、拓宽供给对象的覆盖范围,更能为后续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优化调整提供更为可靠的实践依据。

首先,以动态更新提升供给对象确认的准确性。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所面对的对象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其现实状态会随着网络情境的转换不断发生改变。若供给对象的确认长期建立在既有标签和历史偏好之上,供给活动便易停留于对过去数据的重复确认,难以回应对象现实状态的变化。动态识别则要求将供给对象的确认建立在持续校准的过程中,具体而言,不能再以用户既有标签和历史偏好作为确认供给对象的唯一依据,而应结合其近期行为变化、议题参与情况和互动反馈,对既有对象画像进行动态修正。对于在场景转换中显现出的新特征,应及时纳入对象复核范围,避免以静态标签替代对象的现实状态。与此同时,对象识别的结果还应同步进入供给判断过程,使对象变化能够及时转化为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节奏

调整的依据。只有当供给对象的确认建立在持续更新、及时复核和动态调整的基础之上,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才能真正摆脱对既有画像的路径依赖,并形成更贴近对象现实状态的供给基础。

其次,将潜在对象纳入精准供给的识别视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应当将尚未充分显现、但可能在特定议题和具体情境中迅速进入教育视野的潜在对象纳入识别过程。因此,建议将对象确认从“结果性识别”前移到“过程性发现”。教育主体不能将既有画像视为确认供给对象的唯一依据,而应根据对象在现实互动中显露出的变化,及时发现那些尚未充分进入视野的潜在对象。对于尚未形成稳定偏好记录、但已在具体事件参与或互动过程中显露认知偏移和价值困惑的对象,教育主体应及时将其纳入供给预判范围,并对其由潜在状态向现实教育对象转化的可能性保持持续研判。只有将这部分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对象及时纳入供给视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对象基础才有可能不被固着于少数已被识别的圈层之中,其供给范围也才能随着对象生成过程不断获得拓展。

最后,增强对象识别与供给调整之间的联动性。对象识别的意义,并不止于确认“谁应成为供给对象”,更在于为后续供给调整提供依据。若识别结果仍停留在数据记录 and 对象分类层面,动态识别就难以真正进入精准供给过程,因而,要把对象变化及时转化为供给判断。教育主体应当根据对象关注重心、参与程度及反馈方式的变化,及时校正供给内容的组织重点和供给方式的实施重点,使对象识别结果能够直接进入内容配置和供给安排之中。对于已经出现明显变化的对象,不宜继续沿用原有供给方案,而应结合其最新状态调整内容深度、进入方式和供给节奏。对象变化一旦进入供给判断过程,供给活动本身也需随之作出相应校正。因此,对象识别与供给调整之间保持及时衔接,能推动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根据对象变化不断修正供给安排,避免停留在识别与供给彼此分离的状态。

2. 以优质供给增强普遍性内容的进入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确、权威的信息不

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26]59} 这一论述说明普遍性内容能否持续进入对象视野,始终是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无法回避的问题。算法推荐以既有兴趣和行为反馈为主要依据组织内容配置,虽提高了内容与对象之间的即时适配,却也使供给活动更易向偏好内容集中。在这种条件下,普遍性内容并非完全缺位,而是常常处于供给基础偏弱、供给结构单一和进入能力不足的状态。为此,应从供给端完善普遍性内容的现实支撑,使其在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占有稳定位置,并具备进入不同对象认知过程的实际能力。

其一,应当扩充优质内容供给总量,夯实普遍性内容的供给基础。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所面对的是需求分化、场景多样的对象群体,普遍性内容若要在这一条件下获得稳定发展,首先需要有较为充足的内容储备作为支撑,若优质内容总量不足,精准供给就只能在有限内容范围内进行选择和配置,普遍性内容也难以形成持续供给的基础。因此,只有供给基础足够稳固,普遍性内容才能在算法环境下保持必要的存在强度。与此同时,优质供给应围绕理论阐释、政策解读、现实议题、文化引导和实践教育等形成更为厚实的内容积累,使普遍性内容从原则要求转化为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可以持续调用展开的内容资源。

其二,应当优化优质内容结构,增强普遍性内容的供给适配性。网络思政精准供给中,不同对象的知识基础、接受习惯和场景条件等均存在明显差异,若普遍性内容始终停留于单一的内容形态,其供给过程便易出现“内容存在而对对象无感”的落差。推进优质供给,需将普遍性内容从抽象统一的供给方式中提取出来,转化为能够与不同对象形成更具体适配关系的供给内容。围绕对象差异对内容结构进行重新组织,使理论阐释、案例说明、情境叙事和互动回应等形成更有层次的内容体系,同时使文本表达、图像呈现、短视频转化和场景化表达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

其三,应当改进优质内容表达,提升普遍性

内容的供给进入能力。普遍性内容要真正具备现实进入能力,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才可能从形式上的内容配置走向实质上的价值渗透。在算法推荐条件下,内容进入对象的难点是表达方式能否与对象所处场景发生有效衔接,普遍性内容若始终停留于抽象表达和单向输出,其供给效果便容易受到限制。因而,围绕对象的现实接受特点改进内容表达,普遍性内容在保持思想深度和价值方向的前提下要具备更强的可感知性和可进入性。值得注意的是,改进优质内容表达并不是对偏好逻辑的简单迎合,而是在供给内容不失其普遍育人意义的基础上,提高其进入对象现实生活和具体情境的能力。

3. 以协同治理稳固精准供给的主导能力

平台权力扩张所带来的教育主体主导能力受限问题,是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在运行条件上的结构性变化,教育主体虽承担供给责任,但在数据获取、内容进入和供给实施等关键环节日益受到算法逻辑的制约。精准供给要重新获得较为稳定的主导能力,应围绕主体能力、规则校准和多方协同等层面展开治理,以寻求推动实现算法规制的善治之道,使教育目标、技术条件和供给活动之间形成更为稳定的衔接关系。

一是提升教育主体在算法环境中的供给组织能力。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已不再是脱离平台条件即可独立展开的供给活动,教育主体要在算法环境中保持主导地位,首先要具备在技术条件下组织供给的现实能力。具体来看,应增强对平台运行逻辑、算法推荐特征和内容进入条件的基本理解,使教育主体能够根据不同平台的规则差异、不同对象的接受特点和不同场景的供给要求,对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节奏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安排。通过提高教育主体在算法环境中的辨识能力、判断能力和组织能力,避免供给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长期陷入被动适配的状态。

二是推动平台规则与育人目标形成基本衔接。网络思政精准供给能否保持主导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台规则是否为育人目标预留必要空间。平台算法固然具有提高内容配置效率的功能,但若其分发逻辑完全服从流量转化等指标,优质内容就难以在供给过程中获得

稳定发展。因而,稳固精准供给的主导能力,还应推动平台规则与育人目标之间形成基本衔接。具体来看,应当围绕优质内容进入、普遍性内容保障和关键内容优先配置等方面,对平台规则提出技术运行不脱离育人方向的要求,使算法运行在内容排序和分发安排上能够有效回应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基本目标,在效率逻辑之外承担起基本的价值责任。

三是形成多主体协同的精准供给治理格局。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所面对的主导能力问题,既不是教育主体单独可以化解的问题,也不是平台单方面可以完成校正的问题,其有效治理要求教育主体、平台、技术部门及相关治理力量要围绕精准供给形成更为稳定的协同关系:教育主体主要承担供给目标把握、内容方向确认和供给安排组织等职责,平台需要在数据支持、规则配合和内容保障等方面提供必要条件,技术部门应增强算法工具的可解释性和可调节性,相关治理力量应围绕数据使用边界、内容分发规范和算法应用要求形成制度约束。协同治理将原本分散的供给条件重新纳入同一运行框架之中,使教育责任、平台条件和技术规则能够围绕精准供给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推动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在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中获得稳定的主导能力。

四、结 语

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既是数字技术持续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所提出的一项现实课题,也体现出网络思政供给由一般性覆盖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命题所关涉的,已不只是技术手段的改进和应用方式的调整,更是供给对象把握、供给内容进入与供给主导能力维系的整体重构。未来阶段,应更多着眼于从环节优化走向结构整合、从单点应对走向系统治理。在平台规则持续演化、智能技术加速更新、教育对象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唯有在对象把握、内容供给和主导能力之间形成更具稳定性的内在协调,才能真正推动算法推荐作用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实现技术效能与育人目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答记者问[N]. 人民日报,2025-09-29(02).

[2] 郭根,林旭升.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的运行机理、理论审思与实践展望[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5,41(2):132-137.

[3] 唐志凤,李后强. 困境与纾解:算法推荐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影响探赜[J]. 社会科学研究,2025(6):75-83.

[4] 陈东利,刘映芳.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五重论域[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5):73-85.

[5] 谢慧,周建华. DeepSeek 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机理、运用风险及应对策略[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8(2):104-111.

[6] 王岩,高天赐. 算法推荐与精准思政的辩证理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24(12):28-35.

[7] 邓喆,吕楚笛. 智媒时代精准思政破解“信息茧房”的深层逻辑与实践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2022(8):79-84.

[8] 颜佳华,李睿昊. 网络思政、虚拟思政、数字思政、数据思政、智能思政与智慧思政概念及其关系辨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3):103-110.

[9] 吴满意,景星维. 精准思政:内涵生成与结构演化[J]. 学术论坛,2019,42(5):133-139.

[10] 骆郁廷.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2):1-7.

[11] 段洪涛. 基于大学生网络行为画像开展精准思政的逻辑进路和实施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2026(1):90-97.

[12] 李后东. 高校多模态开展精准思政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及实践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6(1):144-151.

[13] 米华全,伍虹霓. AI 智能体赋能精准思政的机制、困境与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26(3):36-42.

[14] 吴满意,王丽鸽. 从精准到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根本态势分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4):198-204.

[15] 苏玉波,李浩. 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进路[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1):42-49.

[16] 时影,舒刚. 数字化时代高校网络思政育人的价值生成与实践路径:基于主体间性视角的考察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9):69-75.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1-07-13(01).

[1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3.

[19] 高国连,李辉.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 40 年:历程、省思及进路[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5,41(2):93-100.

[20] 史宏波,李尉清.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的问题透视和开新迭代[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12):110-120.

[21] 申小蓉,米华全. 推荐算法赋能大学生价值观塑造:逻辑理路、现实隐忧与优化路径[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7):123-130.

[22] 杨昌华. 算法推荐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准育人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24(4):21-29.

[23] 尼尔·波斯曼.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24] 骆郁廷. 思想政治教育引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16-17.

[25] 凯斯·R.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7] 田方晨. 当代资本主义监控工业复合体的批判性分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1):170-177.

The Tension and Adjustment of Empowering Precise Supply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 TANG Dinghua, ZHANG Jiaji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y is deeply embedded in cyberspace, the targeted supply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formed a dynamic supply process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target identification, content allocation, supply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feedback. As a crucial technical condition for platforms to organize information supply,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im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identifying supply targets, allocating supply content, and adjusting the supply process, and drives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shift from relatively unified content distribution to more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supply. Additionally, the operation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is not inherently aligned with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ringing a series of realistic tension in terms of target confirmation, content orientation, and leading capacity. Specificall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certainty and generativity of educational recipients and the logic of active recommendation may lead to in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supply targets, omission of potential recipients, and rigidification of recipient structure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the weakening of universal content provision tends to reduce the communication space for public-oriented content and reshape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allocation logic of supplied content. Meanwhi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platform power and the decline of educational dominance further undermines the decision-making found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eadership of targeted supply. The algorithm-driven empowerment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recise supply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tension involved, technical fixes are insufficient. It is essential to accurately identify educational recipients through dynamic perception, strengthen the supply of public values with high-quality content, and safeguard the dominant role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vi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reby promoting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to better serve the practical advancement of targeted supply in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rgeted supply; universal content; educational leadership capacity